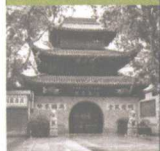


江南贡院



史话

【文 · 化 · 南 · 京 · 丛 · 书】

丛书主编◎李海荣
周道祥◎主编

南京出版社



【文 · 化 · 南 · 京 · 丛 · 书】

丛书主编◎李海荣

江南贡院史话

周道祥◎主编

南 京 出 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南贡院史话/周道祥主编. —南京:南京出版社,2008.2
(文化南京丛书. 第3辑)

ISBN 978-7-80718-342-6

I. 江... II. 周... III. 科举考试-简介-南京市-明代
IV. D691.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5745 号

文化南京丛书

江南贡院史话

周道祥 主编

*

南京出版社出版

(社址:南京市成贤街43号 邮编210018)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丹阳市教育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24 印张 6.5 插页 2 字数 144 千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80718-342-6

定价:20.00 元

历史曾经无比眷顾南京。自今以溯,凡五千年,建业情怀,金陵风物,那些附着在历史虚境上的形声色意,所谓楚秦王气、南朝烟雨、赵宋残阳、明朝宫阙、天国风雨者,或托于古巷,或附于丘阿,或以诗表,或以词生。凡此种种,都在这座古城千年的皇皇之旅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浸染了一种难以言表的文化意味,总让人们在她的历史传承和文化积淀中细细品味出她撼动人心的魅力。

在偌大的一座城中,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人因其各居其所,也就各寻其趣,各怀其思。城南人熟知秦淮河的氤氲之气与夫子庙的俚俗繁华,城西人徜徉在石头城下莫愁湖边,居于城北则会醉心于玄武湖的舒展与鸡鸣寺的空灵,身在城东自然会钟情于紫金山和明孝陵,生活在中心区的人们则会以与总统府和其他众多的民国建筑为邻而自豪。

复复华夏,四野异趣。古来寓居于此者身份各异,谋生、求知或致仕,来了,就在这坦然生息了。他们在此留下不朽之作或成就千古功业。帝王将相、文人骚客,不胜枚举。三国吴大帝构筑建业城,南朝刘勰创制《文心雕龙》,南宋岳飞牛首山大败金兵,明代郑和西航达于至远……古都南京华章迭出,伟业连连,实因地处南北东西交通之所,地理气候条件优越,更兼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具有包容性的文化氛围使然。南京人温厚、大度,不骄躁,少急进,在历史的狂风骤雨中,又显现出鲜有的坚韧与执著。用一个时髦的词汇,南京一直就是一座移民城市。众多寓居在此的人不仅身有所托,更是魂有所依,他们创造的历史传奇或是遗存的文化痕迹,与南京相互交融并一脉相承。

金陵自古就是览胜地。情以景生,景因情胜。在历代文人的笔下,南京不少胜迹都留在了他们的诗章中。著名的如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和杜牧的《江南春》,无论是“金陵王气黯然收”,还是“多少楼台烟雨中”,道出的都是历史的无情与沧桑;而诸葛亮“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的赞誉,孙中山先生“此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此佳境也”的评价,

则是对南京这一帝王之都江山形胜的绝佳颂辞。只是,今人对金陵的寻访大多没有如此的凝重和气度,而是多了几分浮躁和喧嚣。即使有人执意循着当年朱自清、俞平伯的路径,夜泊秦淮;即便同是桨声灯影,当年情韵也只能在遥远的想见中了。念想中与真见时情景的差别常会让人产生略带凉意的恍惚之感,毕竟物非人非了。凡此种种,都属形神相离,览胜者实际都难以获得心神的休憩享受及愉悦体验。要让偶或的览胜成为长久的纪念甚至精神的滋养,确是需要访者与访地一点文化意义上的心会神通。

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是人生再伟大也只能在历史长河中溅起一小朵浪花。在精神物化时,历史也就成了载体组合的进程。多少浩繁的卷帙,多少美妙的词章,都是人依托语言的存在,而“当歌曲和传说都保持缄默的时候,还有建筑在说话”(果戈里)。散布南京全城的一座座古建筑、一处处古遗迹、一件件古文物,是这座千年古城极富文化内涵和悠久历史的最好见证。秦淮河流经的千年烟雨,古城墙绵延的百里沧桑,弥漫其间的,到处都是历史散落的悠悠记忆。在“南京文化”中梳理“文化南京”,是缘结南京的每一个人对文明进程的深情回眸,是一个伟大时代对一个伟大城市未来道路的理性选择,也是今人留给后人的一份值得珍爱的文化馈赠。

我们始终眷恋这座城市,热爱这座城市。在人类适应自然、创造历史的痕迹愈加斑斓的今天,已经出版的《明孝陵史话》、《总统府史话》、《南京寺庙史话》、《南京民国官府史话》、《灵谷史话》、《中山陵史话》、《秦淮河史话》、《夫子庙史话》,以及即将出版的《鸡鸣寺史话》、《栖霞寺史话》、《江南贡院史话》、《甘熙宅第史话》,从一个侧面记录下了名都南京的千年延续。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将成为海内外朋友探幽访胜途中的知己。

《文化南京丛书》编委会

江南贡院位于南京城的东南隅,它东接桃叶渡、南抵秦淮河、西邻状元境、北对建康路,为古之风水宝地。据《南窗纪谈》所载:建康(南京)贡院始建于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由知府史正志创建,起初为县、府学考试场所,占地不大。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集乡试、会试于南京举行。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于北京,但南京仍为留都。因江南地区人文荟萃,原有考场便越来越显得狭小。为扩大考场,朝廷没收了犯臣纪纲的府邸,又取怀来卫指挥陈彬家人陈通、忠勇伯家人侯清等人的房舍,以及府尹黄公永元祠、秦桧之子禧祠等改建江南贡院。后经明、清两代的不断扩建,至清同治年间,江南贡院已经形成一座仅考生号舍就有20 644间,占地达30余万平方米的中国最大科举考场。

古代的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称为大比,这时全国各地的考生便纷纷赶往所在的考场。为了保障考生途中的方便,朝廷发给每位考生一面“奉旨赶考”的小旗,有了这面旗帜,所有的关卡一律免检放行。此种做法虽然为考生提供了方便,但同时也给某些不法商人以可乘之机。商人们以义务送考为由,主动给考生提供车船与马匹,乘机夹带大量的私货贩运至考场所在地。由于古代的关卡负责货物的征税,“奉旨赶考”的车船所载货物便成为免税商品。南京作为全国最大科举考场江南贡院的所在地,每科有两万多名考生。车船所夹带的私货大量涌入,造成了物价的下降,促进了南京的市场繁荣。

过去有句俗话:“北方出豪杰,江南出才子。”江南地区人文荟萃,尤其是每逢大比之年,江南的士子纷纷前往江南贡院参考,而全国各地的名士则利用这一契机赶往南京,以文会友。即使非科考期间,各地落榜士子也纷纷前往南京聘请名师进行考前辅导。仅清一代,经过江南贡院选拔,然后考中状元者58名,占全国状元总数的一半以上。此外,“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唐伯虎、“吴门四才子”文征明、《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桐城派”鼻祖方苞、乾隆时期文豪袁枚、明代科学家徐光启、“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五四运动”的旗手陈独秀等皆出自江南贡院。由于六朝文化的熏陶,

数百年科举的选才,极大地促进了南京地区的文化繁荣。

科举作为封建社会的人才选拔制度,自隋至清在我国延续了1300余年,考选出800多名状元,10万多名进士,上百万名举人。这些人才为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了选拔这些人才,几乎整个社会都行动起来。无论何人,一旦金榜题名,便成为整个家族的荣耀,他自身的价值更是立即起到了由鱼化成龙的巨大变化。所以,每一位考生赶考之时,无论其家庭的贫与富,必然会组织起一批族人为其服务。一般来说,一位士子赶考,送考都少则数人,多则上百人。望族富户一是为考生壮行助威,二是激发族中其他子弟的学习热情,三是顺便游山玩水寻欢作乐,有时也会越过秦淮河前往南岸的青楼寻欢。他们的行为在拉升南京旅游消费的同时也促进了青楼文化的发展。贫穷考生的族人则会带上家乡的土特产品至南京变卖,或是至南京打工卖艺赚钱,供考生消费。据史载,当年南京的居民约25万户,以每户4人计算,约100万人。由于江南贡院的存在,每到大比之年,以2万名考生计算,每位考生送考10人,则为22万人。此外,来南京以文会友的人、旅游购物的人、打工谋生的人,以及商人小贩、考场官员等,估计50万人之多。加上常住人口100万,总计超过150万人。这些人要吃、要喝、要游玩、要娱乐、要购物,也就要有人提供相应的服务,从而促使了南京的教育、医疗、旅游、餐饮、交通、运输等行业的兴旺,使经济空前发展,一度成为我国最繁华的都市。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慈禧太后根据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建议,下诏停止科举,江南贡院便失去了它原有的作用。民国初期,政府根据“拆贡院,辟市场”的建议,仅保留明远楼、飞虹桥等中心建筑以供后人观瞻,其余大部分建筑均被拆毁,化作夫子庙小商品市场。从此,“数百年文战之场,一旦尽归商战”。然而,至今仍竖立于江南贡院遗址上的23块贡院碑刻,则详尽地记载了这一时期内江南贡院的历史兴衰,以及皇帝、大臣、名士等对它的赞誉、评价和题咏。这样无间断记载着几百年科场史实的碑刻群,在全国也仅此一处。虽然它们记载的只是江南贡院的历史,但是通过它们可以反映出中国古代整个科举制度的概貌,所以,它们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科举制度独特的历史见证。

目 录

	001/总序	清代的科举制度/015	
	001/前言	江南贡院与乡试	
	科举制度概述	乡试前的考试/022	
	002/隋代的科举制度	入学/033	
	003/唐代的科举制度	乡试/041	
	006/宋代的科举制度	考场案例	
	008/元代的科举制度	洪武丁丑科场案/096	
	009/明代的科举制度	顺治丁酉科场案/098	


 103/康熙辛卯科场案

名人与贡院


 109/风流才子唐伯虎


 113/神话之父吴承恩


 117/儒雅文士吴敬梓


 江南乡试房官袁枚/121


 扬州八怪郑板桥/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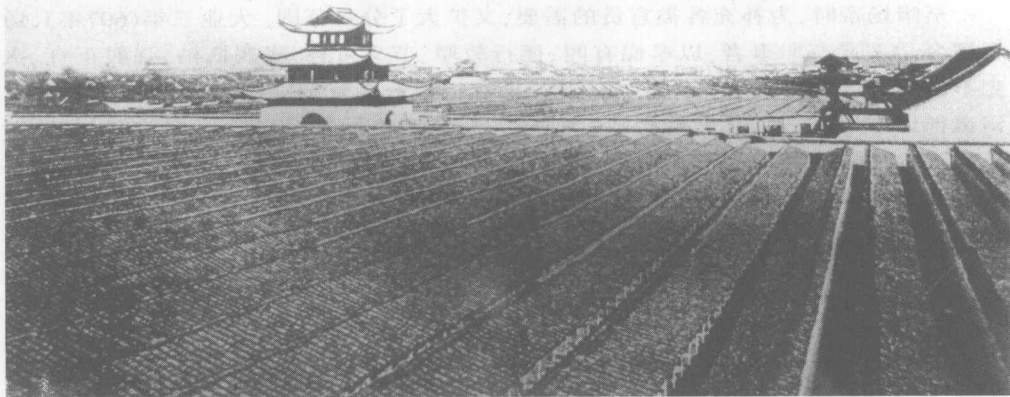

 五四运动领袖陈独秀/129

贡院碑刻

科举制度概述

在南京这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东南隅，曾有一座历时八百余年、占地面积约三十万平方米、考生号舍多达二万零六百四十四间的我国封建社会最大的科举考场——江南贡院。从这里走出过唐伯虎、郑板桥、吴承恩、吴敬梓、方苞、张謇、陈独秀等一大批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在清朝的二百六十七年中，江南贡院考区独占鳌头，其考生考中状元者就达五十八名之多，占整个清代状元总数的一半以上。江南贡院何以如此昌盛？这个问题得从科举制度的形成说起。

江南贡院全景(摄于1888年)



隋代的科举制度

江南贡院史话

中国选官制度源远流长,科举制度则始于隋代。

在隋王朝初建之时,一度也曾实行九品中正制。因为隋文帝杨坚的父亲名忠,为了避讳,便把中正改名为州郡。但是这时的世家大族已日趋没落,而寒门地主的势力则日益上升,九品中正制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文帝时,代理吏部尚书卢恺、侍郎薛道衡因坚持以门第高低作为选用人才的标准,引起了许多人士的反对,结果被罢官免职。为了适应封建经济的发展,加强中央集权,隋文帝于开皇十八年(598年)七月,“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幹济二科举人”。从此,便以分科举人取代了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

至隋炀帝时,为补充各类官员的需要,又扩大了分科范围。大业三年(607年),炀帝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膺力骁壮十科举人。”大业五年(609年),又诏诸郡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膺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这里的“二科举人”、“十科举人”、“四科举人”虽然只是偶一行之,并没有成为一种制度,但是,科举这一名称,则是从分科举人这一概念所产生的。炀帝“置明经、进士二科”,以“试策”取士,在中国的选举任官史上打开了新的一页,科举制度从此产生。

隋代的科举制度

唐代的科举制度

江南贡院史话

唐王朝建立之后,继续实行科举取士,使得这一制度更加完善。唐代的科考,分为常科和制科。每年按例举行的分科考选称为常科,而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则称制科。常科和制科因性质不同,故在考生的来源、考试的内容以及考试方法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

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是生徒,二为乡贡。在唐代,从朝廷到地方的政府都设有学校。朝廷所设的有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地方上的则有州学和县学。每年冬天,这些学校都要将学习期满、考试合格的学生送尚书省参加科考,这类考生就叫生徒。而一些没在学校读书,靠自学成才的人,则需通过向州县申请,经考试合格,再由州府送尚书省参加科考。因为这些考生是随各州进贡物品一同解送的,所以被称为乡贡。

常科的科目,设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算、明字、一史、三史、道举、童子、开元礼等。因为当时一史、三史、俊士、道举、童子、开元礼等科不常举行,秀才一科要求较高,明法、明算、明字等科又不为人们所重视,所以,明经、进士两科就成为唐代常科的重要科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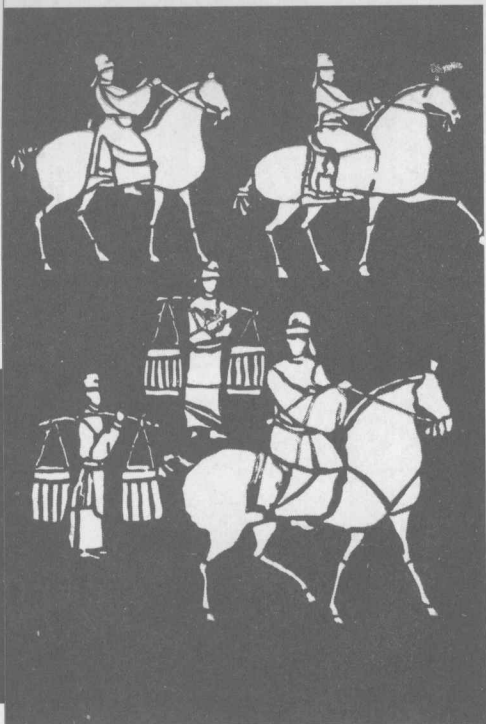
唐代取士,不仅要看考试成绩,还要有知名人士进

像 卿 真 顏



唐代状元、著名书法家颜真卿

唐代的科举制度



唐代考生赶考木雕

行推荐,于是考生们便寻找门路。向公卿名流献上自己的得意之作,时称“投卷”;向礼部投送的称为“公卷”;向达官贵人投递的称为“行卷”。投卷,的确使一些具有真才实学的人遇上了伯乐。据《唐摭言》说:“牛僧孺以《说乐》得韩愈、皇甫湜赏识,杜牧因《阿房宫赋》获吴武陵推荐。”在当时,考试与推荐结合的方法对于选拔人才,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

我国最早的殿试为唐武则天载初元年(689年)二月,据《通典》载录:“策问贡人于洛城殿,数日方了。”只不过,唐代的殿试还没有成为制度。

考中进士,在唐代是荣耀的。金榜登出之后,进士们要在雁塔题名,参加曲江会、杏园宴等喜庆活动。每到此时,曲江地区车水马龙,热闹异常。不但进士们齐聚该地,达官贵人们忙着挑选佳婿,有时连皇帝也亲自赶来,登临紫云阁观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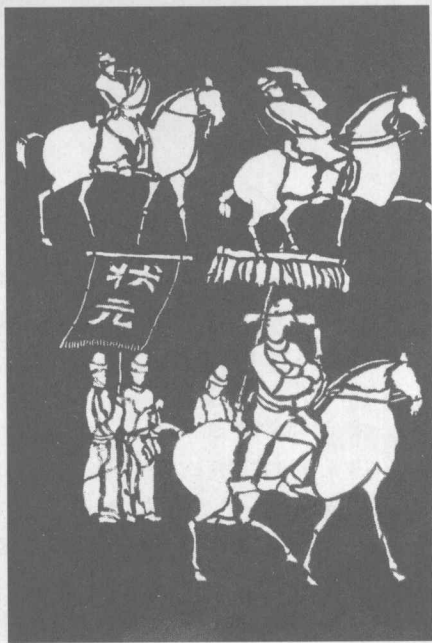
唐代登科的士子并不立即授予官职,还得再经过吏部的考试(称做省试或释褐试),考试合格后,才能授以官职。

唐代的制科是由皇帝特别召集一些知名人士举行的考试科目。制科的名目繁多,据王应麟《困学纪闻》说:“唐制科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其中最著名的有

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等。考试的日期和项目均由皇帝临时决定。应制科考试的人,可以是官员,可以是常科登第的士子,也可以是庶民百姓。制科考试优等的,可以得到较高的官职;考得次一等的,可被授予出身。制科是朝廷用于挑选特殊人才的一种方法,但这些人才在当时却不被人们所尊重。如唐代著名文学家、诗人,《会真记》(即《西厢记》蓝本)的作者

元稹,于唐贞元九年(793年)考中明经状元,登门拜访诗人李贺。李贺不容入门,仆人谓曰:“明经及第,何事来看李贺?”真是让人难以相信连制科出身的状元都被人如此轻视。

在常科与制科之外,还有武举。武举始于唐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参加武举考试的人与明经、进士科的考生一样由各州举送,只不过武举是由兵部主考,考试的项目为骑射、步射、平射、枪马、负重等。据《通典》说,武举中“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但在当时,武举并不被人们所重视。唐代的封建统治者虽然把科举取士放在选官制度的首要位置,但通过科举考试而入仕的人,在数量上却很有限。当时的统治者为了稳定和安抚高官权贵,使他们的子弟不需经过科举考试也能在封建政权中获得一定的官职,同时为了让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士也可以取得一官半职,于是在科举之外又开辟了门荫、应募从军、杂色入流等多种选官途径。



唐代考生状元及第来雕

宋代的科举制度

江南贡院史话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起北宋王朝。为进一步杜绝武将拥兵自重的状况,他任用文官主持军务,从此,重文轻武成为宋王朝的基本国策。为了大量选拔人才,充实庞大的官僚统治机构,宋代的科举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宋代科举考试的科目很多,据《宋史·选举志》载:“宋初承唐制,贡举虽广,而莫重于进士、制科,其次则三学选补。”庆历四年(1044年),宋仁宗根据范仲淹、宋祁等人的建议,令各州县设立学校,并规定在校学习满三百天的人才能参加取解试。省试分试策、试论、试诗赋三场,以三场的成绩作为录取依据。

宋熙宁年间,王安石主持朝政,实行了一系列的变法,同时对科举制度也进行了重大改革。罢诗赋、贴经、墨义。为实现利用学校培养人才的目的,王安石又将太学生分为三等:外舍、内舍和上舍,以考试的成绩和平日的学习品行作为升舍、应试及授官的根据,这便称作“三舍法”。

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司马光入朝执政。此时,他陆续废除各种新法。元祐四年(1089年),司马光将进士分为“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至宋哲宗亲政后,又否定了司马光的做法。据《文献通考》载,绍圣元年(1094年),又重新实行“进士罢诗赋,专习经义”。

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将三舍法推广到全国,并诏示天下:“将来科场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其州郡发解及试礼部法并罢。”根据规定,普通百姓必须通过考试才能入学,而官僚子弟则可免试入学。这种“利贵不利贱,利富不利贫”的做法,遭到了广大

宋代的科举制度

下层民众的反对,迫使朝廷于宣和三年(1121年)宣布“罢天下三舍法,开封府及诸路并以科举取士;惟太学仍存三舍,以甄序课试,遇科举仍自发解”。

宋初的科考分两级,一级是各州举行的取解考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取解试主要为各州的判官和录事参军主持,省试则由皇帝选派的官员主持。据《宋史》载:开宝六年(973年),翰林学士李昉知贡举,录取进士,诸科及第者三十八人。这时,下第进士徐士廉控告李昉“用情取舍”,并建议举行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太祖下诏,从已被录取和未被录取的考生中挑选出一百九十五人,在讲武殿复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复试结果,得进士二十六人。原先被李昉录取的人中,竟有十人落选,为此李昉受到了降职的处分。从此,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考试,而被录取的人则成为“天子门生”。

许多在省试中合格的考生,到了殿试时却名落孙山。其中有一位名叫张元的考生,因多次参加殿试均未能中,在仕途无望之下,他投奔西夏,成为西夏王朝的谋士,为西夏王朝侵犯大宋边界出谋划策。于是,在宋嘉祐二年(1057年),仁宗皇帝下旨:“进士殿试,皆不黜落。”自此以后,凡省试合格者,在殿试中只有名次的先后,再也没有殿试落榜的现象。



宋代状元文天祥

元代的科举制度

江南贡院史话

元代的政权是以蒙古贵族为主体。蒙古贵族有着自己的一套选拔和用人的制度,因而在设科取士方面阻力重重。后来虽然勉强实行,但由于存在严重的民族歧视政策,比起唐、宋、明、清的科举取士难免相形见绌。

元代的科举分乡试、会试、御试三级,每三年一次。元朝统治者把全国各族人士分为贵贱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即指西域各部及中亚地区各族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指南宋统治下的江南汉人和西南各少数民族。在此情况下,考试程式也有所区别。蒙古人、色目人试二场,汉人、南人试三场。在考试内容方面,对汉人、南人的要求也比对蒙古人、色目人严格得多。如果蒙古人和色目人愿意考汉人、南人的科目,考中者在授官时可以官加一等。

据《元史·选举志》、《续通考·选举》等书的记载统计,元代共举行科考十六次,仅录取进士一千一百三十五人,汉族儒生想通过科举进入仕途非常困难。所以,对读书人不尊重是元代社会的普遍风气,当时就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读书人的地位与娼妓、乞丐一般,这就使得广大汉族知识分子前途渺茫,许多人被迫放弃学业,以至一时“天下习儒者少”。

元代的科举制度